环球瞭望

中国应承担什么样的大国责任

□罗建波

西方国家常从它们的国际秩序及其全球利益出发，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未能承担应有的国际责任，并对中国提出了种种批评和指责。毫无疑问，中国应该根据自身经济的不断发展而不断增加对世界的贡献，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但在对谁负责、如何负责以及负多大责任等问题上，仍需要根据自身能力、国家利益及国际社会大多数人的需要来确定。

“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是当前中国较为恰当的身份定位

探讨中国的国际责任，离不开对中国国家身份的界定。

首先，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从人均经济份额、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以及其他社会综合发展指标来看，中国在相当长时期里仍只能算作发展中国家，更何况中国还有幅员辽阔且经济仍十分落后的中西部地区，以及按联合国标准还有超过1亿的贫困人口。如果把中国与美欧发达国家进行对比，不难发现，中国离发达国家都还有很大距离，中国还是一个真正的发展中国家。正如外交部王毅部长所提醒的那样：“我们清醒地意识到，发展不平衡仍然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发展中大国仍然是中国的基本定位。中国还并非富国强国，要让13亿中国老百姓真正过上幸福生活，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同时，中国也要自信地认为，中国是一个大国。无论是中国的经济总量、人口规模、外汇储备，还是不断增长的对外贸易和投资，都表明中国并非一个普通的发展中国家。而且，国际社会对一个国家是否是大国的评价，并不完全取决于该国的人均经济水平，而更多地看其经济总量及其总体的国际影响力。这也是为何中国一再宣称自己是发展中国家，而国际社会总以为中国应该承担更大责任的重要原因所在。

因此，在自身国力不断发展的基础上为世界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也是一个发展中大国所应尽的国际责任。而且，坦诚地承认自身的大国地位及国际责任，也有助于中国从更高层面上运筹外交大局并增进自身利益与话语权，也有助于培育国人成熟的大国心态，从而更好地引导和改善国内舆论环境以支持中国奉行更加积极进取的外交政策。中国外交需要注重维护并增进自身利益，同时也需要在自身国力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承担应有的国际责任，体现出国家利益与国际责任的有机统一。

对谁负责，负什么责任

中国履行国际责任，自然需要与西方主要大国进行合作与协调，共同参与全球治理进程。中国也需要积极参与国际体系并维护现有国际秩序的基本稳定，这是推动国际秩序变革与完善的重要前提。但中国的国际责任不是分担西方大国的霸权成本，更不是去维护它们的私利，而主要是维护并增进发展中国家及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这是因为，由于发展程度的不同及国家利益的差异，西方大国所关注的议题以及它们希望用国际机制去解决的问题就与发展中国家存在事实上的差异。比如，美国视反恐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为其国家安全战略的优先议题，并把它们作为当前全球治理中的重要议题。不过，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看来，因贫困和疾病而带来的死亡远比恐怖主义的危害更甚，常规武器、轻小武器的扩散所带来的危害也比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危害更为现实。事实上，美国虽然是当前国际秩序的主导者和国际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但它代表不了全世界的利益和愿望。

发展中国家是世界的大多数，也是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及日益增多的全球性问题最为集中、最为突出的地区。以国际和平与安全为例，2002—2011年间全球共计发生73起国内冲突或国家间冲突，大多发生在非洲、亚洲、拉美的发展中国家及东南欧的部分转型国家。再以世界范围的减贫与经济发展为例，虽然部分发展中国家获得了较为快速的发展，但这并未因此改变南北双方在物质财富、发展程度、科技水平和国际地位等方面存在的严重不平等，当今世界仍然是典型的非均衡发展的世界。

以发展中国家利益为重进而增进全人类共同利益，还与中国的利益与身份认同有关。虽然中国经济总量和国际地位得到显著提高，但中国发展的不平衡性及发展任务的艰巨性决定了它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且，中国对“发展中国家”概念也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和认知，认为“发展中国家”自始便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概念，而具有更为丰富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属性。西方国家在使用这一概念时，通常是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指称那些经济发展水平尚未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的欠发达或不发达国家。而在中国的外交思维中，当代“发展中国家”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过去“第三世界”的延续和发展，当代发展中世界的南南合作也与过去亚非万隆会议、不结盟运动和七十七国集团的活动一脉相承。虽然亚非各国已相继实现了政治独立，美苏两大集团对第三世界的争夺也已不复存在，但这些曾经并肩作战的亚非拉国家仍然面临实现经济发展和国家现代化的发展任务，在国际事务中也面临相似的政治和外交需求。正是从这个角度讲，中国现在是、将来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一如既往地推动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仍是中国外交的重要方面。

如何为发展中国家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经济上，以“正确义利观”推动与发展中国家的互利共赢，当前尤其需要注重推动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做到“授人以鱼，更授人以渔”；在安全上，与时俱进地理解“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建设性参与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事务，更好地彰显中国人的世界情怀和人道主义精神；在治理模式上，与发展中国家分享经济社会发展、制度建设和政府治理能力等方面的经验，以此提升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发展能力并增进中国在世界发展领域的话语权；在国际秩序上，中国的责任不仅只是维护现有国际秩序的稳定，也要积极推动国际秩序的改革、促进国际正义的实现，从而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营造一个更为公平、公正的国际环境。即便是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发展中国家仍将是中国履行大国责任的主要区域。

中国履行大国责任所应坚持的基本原则

中国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国家，既是中国对国际社会的慎重承诺，也是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期待。但是，如何界定自身的责任大小，怎样做才能既有益于自身的发展又能满足国际社会的期待？这就涉及中国履行国际责任时所应坚持的基本原则。

坚持量力而行的原则。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其紧迫的任务仍在于解决国内亟待解决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思考和履行中国的国际责任，就需要坚持量力而行、量入为出的原则，基于发展中国家这一基本国情而不能超前承担超过自身经济承受能力的责任和义务。所以，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始终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在积极推行节能减排的同时，也要求发达国家承担更多的责任。在非洲和平与安全问题上，中国积极支持联合国和非盟所主导的维和行动，不断加大对非安全投入，但中国无意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全面介入非洲的内部冲突，像欧美大国那样去做非洲国家的“保护人”。即便是从军事的角度讲，现阶段中国军队也缺乏大规模的海外投送能力，在军事指挥、信息支持、后勤保障、国际交流等方面还缺乏在海外直接作战的经验。所以，在国际社会对中国责任的期待与中国履行责任的能力之间，还存在事实上的差距。

坚持权责平衡的原则。权责平衡的原则首先意在说明，中国承担了国际责任，也就应当享有相应的国际权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参与和塑造国际秩序，显著增进了自身国际权益并极大改善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成为当前国际秩序的主要受益者之一，这是中国和平发展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因素，也是当前中国愿意承担更大责任的重要前提。不过，国内仍有不少学者担忧，美国等西方大国一直呼吁中国做“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其实质只是希望中国进一步分担其全球治理成本，不愿意也不会让中国分享全球领导权。因此，中国在观念上务必清醒，中国所承担的国际责任，应当有助于提升自身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增进在国际机制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同时，通过与西方大国在全球治理中的相互合作，应明确要求美国、欧洲放松对中国的技术限制和垄断，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及重大关切。

权责平衡原则还表明，一个国家在享有国际秩序所带来的经济机遇及和平红利的同时，也应根据自身实力而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而不应只做国际社会的“搭便车者”。特别是对世界上的一些较大国家而言，它们就不仅仅只是关注自身利益，也应有心怀天下的大国精神，这是一个大国所必需的国际形象和声誉资产，是一个大国之所以赢得世界尊重的重要条件。所以，如何做到权与责的大致平衡，是中国在快速崛起进程中必须思考的重要外交课题。

坚持互利共赢的原则。互利共赢是当前中国外交的基本理念之一，也是中国履行国际责任所应坚持的基本原则。在笔者看来，中国不断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援助和安全投入，是当前南南合作的重要形式，是新形势下发展中国家实现互助互利、共同发展的重要途径。比如，非洲政局动荡不仅危害着非洲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显著制约了非洲的经济社会发展，也对中国在非洲日益扩大的海外利益带来了直接威胁。因此，不断深化中非安全合作，在帮助非洲国家实现政治稳定的同时，也自然有助于维护并增进中国在非洲的海外利益，这也是一种互利、互助和双赢。

在全球化不断推进的今天，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仅只是利益共同体，也是安全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因此，在维护自身海外利益的同时不断推动发展中国家及全人类共同福祉的增进，在积极参与全球事务的进程中更好地增进自身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是中国思考大国责任的重要维度。

会议综述

如何评估外部环境

□陈积敏

2014年7月17日，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主办、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校协办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暨第二届全国党校系统国际战略研讨会”在广西南宁举办。以下问题是研讨重点。

中国的外部战略环境评估与应对

客观评估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外部环境是中国制定科学、合理、有效的外交政策的前提。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马小军教授认为，目前对于国际形势总的判断是各种势力都在进行战略再平衡。此次战略再平衡的主要动因是中国的强势崛起，这是近百年来从未有过的现象。从历史上看，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影响主要局限于东亚地区，但这一次却具有全球性意义。可以说，中国崛起的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世所罕见，中国与世界都没有在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等方面做好准备。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也面临着一个战略再平衡的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平衡，其二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与国家安全战略底线的平衡。因此，中国应树立“大国安”的意识，将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等问题综合统筹。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原所长宫力教授认为，中国的外部战略环境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之间有紧密关系。但是，美国再平衡战略本身就具有不平衡性。主要体现在：首先，经济手段与军事手段的不平衡运用，美国过多关注军事层面的投入；其次，对亚太地区国家间关系的处理存在不平衡性，美国在诸如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上将天平明显偏向了日本、菲律宾、越南等国。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国首先应保持战略自信；同时，还要保持战略定力，正视美国在亚洲存在的现实。中国不要幻想将美国从亚洲赶出去，美国也不能奢望将中国压下去，而应该学会和平共处，太平洋足够大，中美两国有足够的空间在这一区域内实现共赢。

中国周边外交形势与国家利益维护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秦治来教授具体讨论了转型时期的缅甸局势与中缅关系。他认为，缅甸对于中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是新时期中国经略周边的优先外交支点。目前，缅甸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处于进行时，民族和平进程也在不断推进之中，其融入国际社会、争取西方援助的意愿表现强烈。客观来说，缅甸政治转型对中缅关系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中国需把握缅甸政治变化的特点，提前制定预案，并积极参与缅甸的经济发展，通过经济力的牵引与稳定作用来推动中缅关系的发展。要发挥沿边城市的区位优势，给予它们先行先试、特行特试所需的政策条件；加强对缅甸的信息传播能力。

广西社会科学院孙小迎研究员对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维权的优势、劣势及对策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她认为，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具有明显的历史优势与法理优势，在维护南海权益上应该充满自信。中国需改变舆论战劣势，加强对对象国的研究，同时要精细化历史研究与法律研究，为我国的南海维权提供坚实而充分的证据链。广西大学张力文教授则从积极利用国际组织，提升中国话语权的角度分析了中国维护国家利益的问题。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教授主要分析了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所面临的新问题，指出中国政府与海外企业需要处理好几个方面的关系与问题。一是不干涉内政原则与国家利益维护的关系问题。二是“做”与“说”的关系问题。三是东道国政府利益与民间利益的关系问题。四是“硬利益”与“软利益”之间的关系问题。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等方面的投入较多，但是在文化教育、新闻舆论等方面做得较少，或者是效果不彰；中国对于民间组织、宗教势力等社会性力量的关注和参与明显不够。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与中国—东盟的关系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纪军教授分析了中国—东盟经贸关系。她指出，双方正在打造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钻石十年”，这需要双方在金融合作、货币互换等领域的加强合作，同时发展中国与东盟的互联互通，加快推进公路、铁路、水域、能源等领域的合作。对于中国—东盟经贸关系来说，美国正在全力打造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是一个重大挑战。因而，中国需积极应对，加快推动与东亚经济体实质性区域经贸合作的进程，不断提升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水平；巩固中国与智利、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太平洋国家的经贸合作关系，拓展中国对外贸易的新空间；密切跟踪和研究TPP谈判的议题与进程，在适当的时机，以适当的方式参与TPP谈判。

广西区委党校凌经球研究员就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与中国—东盟关系发表了见解。他认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方向应该是东南亚地区，故中国应将东盟作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目前，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发展存在着一些障碍，双方需携手共建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与情感共同体。广西北部湾经济区规划建设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梁金荣博士也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提出了观点。他认为，“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对内外挑战的积极回应，是实现两洋战略的重要突破口，是推进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谋划，而广西在其中具有重要优势。

人民行动党善用价值观引领社会

□姜 跃

新加坡是一个很小的国家，也是一个有口皆碑的国家，人们对它的国家和社会治理津津乐道。新加坡是如何做到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对意识形态的观念理性而务实，并在此基础上以共同价值观建设国家，引领社会，稳定人心。

理性务实的意识形态观念

“政党是意识形态的载体。”任何政党都有一套自己的价值理念、价值目标和价值追求。不同的政党上台执政，会有不同的治国方略，对同样的问题会有不同的解决方案，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所信奉的意识形态不同。执政党治国理政的路线方针政策，实际上是意识形态在实践中的转换。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也不例外。

1954年11月，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成立。它宣称代表工人阶级利益，信奉民主社会主义，并以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为己任。为了统一思想，鼓舞斗志，它以高调的意识形态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也因此被看成是具有革命性的极左派之一。

但是，1959年，当新加坡获得了自治，人民行动党掌握了政权，成为执政党之后，就开始理性地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这种转变，正是从意识形态的观念开始的，执政前是高调的革命性的理念，执政后则转为低调务实的建设理念。在人民行动党看来，党的根本目标是要建设新加坡，解决民族生存问题，是要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而党只不过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因此，人民行动党作为执政党，必须为全国的利益尽力，而不是为一个阶级的利益尽力。它反复强调国家利益，并誓言把自己建设成“代表国内各方面利益”的政党。

基于这样的认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对意识形态采取的是实用主义态度。它不再执著于任何理论和教条，而是广泛吸收各种主义中对新加坡发展有益的成分。传统的儒家思想、资本主义的观念、社会主义的原则、民族主义的精神……各种主义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这里，融合杂陈，以至于形成了被外界称为“非驴非马非骡”的独特的意识形态和执政理念。人民行动党在意的不是意识形态的光谱，而是治国理政方略和具体政策的实效性和可操作性。这种理性务实的意识形态观念，开放、包容、灵活，适应性很强，为社会共同价值观的打造奠定了基础。

以共同价值观引领社会

一个执政党能不能得到社会民众的广泛认同，不仅取决于它的政治领导，而且取决于它的文化引领。也就是说，除了依赖国家权力来维持政治经济社会秩序之外，还必须具有意识形态的领导权，通俗地说，即话语权，以使社会民众在心理、观念上自愿地接受和顺从其领导。执政党“将自己的价值观、信仰和意识形态普遍推行给社会各阶级的过程是一个赢得价值共识的过程，也是领导权实现的过程，它不是凭借暴政和强力，而是通过大多数社会成员自愿认同来实现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深明此道。

执政伊始，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根据新加坡华人占人口多数的社会现实，注重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挖掘资源，把意识形态的创建与传统文化的承继相结合，在意识形态的本土化上下功夫。李光耀大力倡导儒家的八德，即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并赋予它时代的新意。但是，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前行，受西方影响，新加坡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对新加坡的传统价值观、社会稳定和人民行动党的威权政体形成了挑战。为应对挑战，解决问题，化解矛盾，安抚情绪，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开始积极寻找出路，致力于打造一套能为各种族和各种信仰的新加坡人都能接受的共同价值观，为此提出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种命运”的口号。经过艰苦的努力和探索，1991年，吴作栋以总理名义向国会提交了《共同价值白皮书》，经过讨论获得批准，并向社会公布。由此，五大价值观即“国家至上，社会优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成为新加坡人民的共同价值观。这套价值观既坚守了儒家文化传统中的家国情怀，又融入了现代文明宽容、妥协、开放的民主精神，可谓守得住根，放得开怀。它言简意赅，简单明了，当各种利益交结在一起时，有了明确的指引；在处理多元社会的矛盾时，有了清晰的原则。这大大增进了新加坡的国家认同、社会认同，使新加坡社会能够在时代的发展中保持健康有序、和谐稳定。

把观念转化为行动

执政党的思想观念在多大程度上被社会所认同和接受，重要的不只是它的内容和形式，而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能否感受到它的存在和价值，能否在日常生活中真实地捍卫和维护国家、社会和民众的利益。所以，执政党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要想有效地实现意识形态和文化的领导权，不仅需要善于提出为社会民众所喜闻乐见的思想观念，更重要的是在执政实践中自觉努力地去践行这些观念。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价值引领之所以有效，跟这个党说到做到、言行一致的行动紧密相关。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长期的执政实践中，把自己提出的每一个观念都看成是对民众的政治承诺，并努力去实现这种承诺。无论是制度建设，还是政策制定都力求与党所提出的价值观相吻合。例如：

在政治上，它倡导儒家的价值观，同时吸收了西方文明中的民主思想，两者融合，建立起一套有别于西方民主的改良型民主制度模式；它说要代表人民，为人民而行动，就把选择议员和政府的权力交给人民，让代议制政府五年接受一次人民的评判，并建立起政府部长和议员定期会见民众的制度；它把法治作为治国理念和理想，就认认真真去实现依法治国，为树立起法律的尊严与权威，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上下一致，执政党也不例外，也要依法治国，人民行动党通过法律程序，把党的思想路线变为国家意志，通过政府贯彻执行。

在社会政策上，它倡导种族和谐，就通过政府的租屋分配政策，打乱了过去按种族居住的局面，变种族聚居为种族混居，以此促进不同种族的沟通和各种文化交流，并采取具体政策为少数族群的就业和发展提供保障；它把家庭作为社会的基石，让人们以家庭为根，便有了针对儿女买房，如果离父母近，能够照顾到父母，就可以得到国家补贴的政策。

人民＋行动＝人民行动党，为了人民的福祉而行动，是人民行动党的建党宗旨，几十年的执政实践证明，它没有辱没自己的名称。它不只是标榜“为人民”，而是真实地“为人民而行动”。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变化，但是，人民行动党始终保持着自己的政治敏锐，坚守立党之本，与时代同呼吸，与社会共命运。为了人民，它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观念，以开放的胸怀，学习吸纳各种有益的思想，并善于将美好的政治理念转化为有效的行动，有言必行，有行必果。

外国政党研究